預算案配合施政方向

□陳振寧

港事港心

剛公布的現屆政府首份預算案配合了施政報告的政策方向，確立日後政治運作的框架。無論在產業發展以至紓解民困方面，它都提出了針對性措施。同樣重要是，它爲長遠公共財政的規劃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是次預算案確立了施政報告主導，預算案配合的重要原則，爲以後的政治運作定下框架。施政報告的主調是，「改善民生必須靠經濟，促進經濟發展就是爲了改善經濟，民生改善就可以爲香港社會提供更安穩的營商環境」。這種民生和經濟並重的思維，體驗在預算案裡。預算案提出的措施都是圍繞推動經濟、優化人才、投資基建、關顧民生四方面。人才和基建有助經濟發展，而只有經濟發展起來，民生才能顯著改善，施政報告的主調在預算案裡得到呼應。

施政報告重視產業發展，要把產業「做多做闊」，提高香港整體競爭力，預算案在這方面落墨甚多。上一屆政府較多使用土地、稅務、資助等方式，但是次預算案裡，政府擔當更爲突出的角色，積極強化人才培訓、宣傳、對外聯繫等工作，例如在重點發展的創意文化產業上，預算案撥款委約本地藝術家爲公共藝術計劃創作，以提高其知名度；要求貿發局在內地增設「香港設計廊」，以協助香港企業打造品牌，進一步開拓市場；向東盟提出加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以協助香港商界進一步發展東南亞市場等。

對於部分已發展至樽頸的產業，預算案提出措施，以求突破。以旅遊業爲例，隨着內地來港旅客漸多，香港的承載力備受考驗，包括部分景點過分擠擁；酒店房間數目不足，出租價格長期高企；零售業興旺，對人才需求殷切等。就此，預算案公布落實擴建海洋公園和迪士尼樂園的計劃，增建酒店，同時，設立人力發展專責小組，研究旅遊業的人才需求。

針對性紓困 不人人派錢

至於紓解民困方面，如施政報告所述，這些與財政有關的決策都在預算案中公布。雖然預算案提出的一次性紓困性措施未有太多驚喜，但是具針對性，而不是無差別向每位市民派錢。

至於關愛基金方面，它由成立至今，提出多個計劃如爲舊樓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津貼、爲長者提供牙科服務資助等。這些措施能短持間內有效、快捷地支援有需要的人士，填補了社會保障制度未能顧及的部分。當有措施取得明顯成效，政府會把此納入爲恆常性措施。該基金過去兩年在試驗、識別有需要人士等方面的工作值得肯定。預算案向該基金注資150億元，連同該基金已有的50億元，每年投資回報足以讓該基金持續推出扶貧計劃。

預算案也如施政報告般，肯定政府在市場失效時的角色，只是用語上有些差別。施政報告表明，政府會「適度有爲」，當市場失效時，政府會有所作爲。預算案也指市場失效時，政府會將市場回復平衡。這些做法都有助消除預算案未能配合施政報告的憂慮。

預算案也爲香港公共財政的長遠發展作出謀劃。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問題是不爭的事實。就此，預算案提出成立工作小組，以研究如何在公共財政上爲人口老化、長遠的公共財政承擔等作出規劃。政府願意踏出第一步值得肯定。

然而必須指出，從財政角度考慮有關問題並不足夠。市民生育的意慾偏低，究其原因，與其遇上突出的房屋、教育、醫療等問題有關。這些問題必須依賴政府的長遠規劃。另一方面，香港人口結構還與外地人口移入有關，現時移入人口未能充分補充香港的發展需要。政府可在此嘗試更積極、主動的措施，以更快地調整人口結構。預算案建議設立的工作小組應與人口督導委員會定時交流意見，以制訂香港長遠的人口藍圖。

作者為亞太國際關係學會成員

政府應尊重浸大發展訴求

□茹志俊

議論風生

前李惠利校舍用途何去何從，成爲特區政府棘手問題。當前困擾香港的是土地供應短缺問題，政府亟欲將校舍變成私人住宅用地，以增加市場供應。但浸會大學面臨校舍面積狹小、興建中醫院的發展需求。一個是火燒眉毛的當即需要，另一個是支持教育發展的原則問題，如何取捨？這似乎是一個兩難抉擇，但作爲一名政治家，應當具備向香港未來負責的魄力。梁振英政府應當明白，教育發展是維持香港競爭力的根本，不應該也不必要爲了增加一千個住宅單位而去犧牲長遠的利益。

不應貿然改變土地用途

儘管社會對該校舍如何使用存有不同意見，但作爲利益的直接關連一方——浸會大學，其意願應當獲得足夠的重視。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沒有進一步諮詢的情況下，發展局將李惠利校舍列入下年度賣地計劃之內。雖然陳茂波局長強調，列入計劃表是按既定程式去做，「不意味即時賣地」；並預計最快在2014年才能推出該幅土地。而城規會將會作出討論後，決定該幅土地用途。但一幅土地由早前用途未明，突然變成賣地對象，這已代表了一種強烈的政策傾向。假若政府眞的抱着不偏頗的立場，就不應該如此貿然訂下賣地時間。

事實上，政府如此態度，令人質疑是否眞的經過深思熟慮。浸會大學儘管不是香港最「好」的大學，名聲不如中大港大科大，但數十年來爲香港發展輸送大批人才，其貢獻應當獲得肯定。更何況，浸會大學校舍之少是衆資助大學中之最，而此次所爭取的並非行政用地，而是惠及全港七百萬市民的中醫院大樓。一個如此弱勢的學校，一個如此面向公衆的意願，竟然也會被忽視，又豈能不令人質疑有關官員的能力？

當然政府也有衆多理據支持其決定。例如，前李惠利校舍的北面部分面積爲2萬平方米，足能滿足浸大發展教學的需求。若批出整塊用地，將超出浸大的發展需要。不僅如此，陳茂波局長甚至從「技術」上要擊倒浸會大學。他指浸大直至今年一月才向教育局表達，研究在前李惠利校舍用地發展中醫教學醫院的可行性。而政府現時並無政策去支持資助學院建立中醫教學醫院，即使浸大有意興建，亦可於其他地區選址。

政府要增加土地供應以平抑樓市，其出發點應當肯定。但當局提出的諸多理據，卻沒有一條站得住。首先，何謂「超出浸大的發展需要」？浸會大學土地面積少得可憐，從港大中大相比，堪稱是巨人與小童之差。就算納入該校舍，亦遠遠跟不上其他大學。李惠利校舍難得之處在於，它就在浸會大學一街之旁，其協同效應不用多說。難道當局認爲，浸會大學不配「一體化」發展、反倒要捨近求遠去另覓土地？退一步說，就算浸會大學「太晚」提出發展意願，但難道政府僅僅是以「時間順序」來決定政策？政府政策不是應該全面考慮、何以如此目光短淺？

其次，陳局長說，「政府現時並無政策去支持建立中醫教學醫院」，這話並不準確。以特首梁振英當年擔任校董會主席的城市大學爲例，當局並沒有政策去支持香港發展獸醫學，何以城大在否決後又繼續提出申請、而當局又似乎在重新考慮其申請？事實上，回歸十五年來，過去三屆特首都以不同形式表達對香港發展中醫中藥的支持。

制定政策不能自相矛盾

例如，董建華在首份施政報告中明確表示：「我深信香港具備足夠條件，能夠逐步成爲一個國際中醫中藥中心，在中藥的生產、貿易、研究、資訊和中醫人才培訓方面都取得成就，使這種醫療方法得到進一步發展和推廣。」曾蔭權在競選連任時也多次表明，會不斷投入資源支持中醫中藥的推廣與發展。就算是梁振英，也在不久之前決定，成立「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當時政府表明：「擴大中醫中藥在公營醫療系統的角色，以及設立中醫住院服務等。」既然如此，又怎能說「沒有政策去支持興建中醫教學醫院」？這不是政策互相矛盾？

按政府的說法，城規會最快要到2014年才會決定該幅土地的最終用途。這種做法其實非常可笑，本來完全可以由政府主導決定教育用途，卻要以行政手段去推卸責任，甚至「假手於人」去否決浸大要求。做法如何令人信服？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特區政府應當讓公衆看到其支持教育發展的決心。短暫的眼前政治需求，不應成爲損害公衆利益與健康的藉口。梁振英及其政府應當有這種魄力，去做於香港社會、於七百萬市民健康有利之事。

執政黨奏響兩會主旋律

□耕 野

即將開幕的全國兩會，將向世界傳遞什麼樣的「中國新聲音」，關乎「新一屆國家領導層」誕生後，中國將向全球奏響什麼樣的「改革新樂章」。中共十八屆二中全會定下的基調，是執政黨堅持協商民主制，與時俱進地制定出的科學發展基調，為兩會奏響了主旋律。

神州點面

兩會開幕在即，世界各國目光聚焦中國，關注着「和平發展與冷戰危險交叉並行」背景下，兩會將向世界傳遞什麼樣的「中國新聲音」，關乎「新一屆國家領導層」誕生後，兩會將向全球奏響什麼樣的「改革新樂章」。筆者以爲，日前結束的中共十八屆二中全會定下的基調，奏響了兩會主旋律。

高層人事最重要

政協開幕前三天，北京又是霧霾、沙塵、狂風天氣，而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的民主協商會，卻充滿溫馨、團結、和諧氣氛，彷彿暗示習總書記「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的深刻寓意，也彷彿象徵當前「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的中國風骨。協商會就中共中央擬向兩會推薦的國家機構及全國政協領導人選建議名單，向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通報情況，聽取意見。習總書記強調，「搞好新一屆國家機構和全國政協人事安排特別是高層人事安排，是開好全國兩會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是關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局的大事。」政治局對「高層人事安排」高度重視，在充分發揚民主、全面考慮人選條件、各方面結構要求和工作需要基礎上，提出了建議名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就名單作了說明。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主席和無黨派人士代表共十位發言，認爲建議名單是在廣泛徵求意見、充分醞釀協商基礎上形成的，考慮比較周全，表示擁護和贊成。人們有理由相信，兩會定能選出最稱職的國家高層領導。

筆者以爲，執政黨提名單，合作黨議名單，符合中國協商民主制程序。近期中共把「堅持黨的領導」、「保持與黨高度一致」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轉變作風」同時提到空前高度，是因爲在當今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下，中共領導更顯「中國魂」的地位與作用；習總書記強調「特別是高層人事安排最重要」，是因爲「頂層設計」的戰略目光將決定「中國夢」的前景與命運。

延續協商民主制

筆者以爲，「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是中國政體的基本特色，也是政協的基本職能。2008年中共17屆2中全會首次提出「三權制約與協調」政體原則，即「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有五個要素：「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習總書記在全會上指出「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體現，也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一貫做法。」他高度評價民主協商制並對民主黨派提出殷切期望：在座各位同志，多年來同我們黨親密合作，對黨的工作和國家各項事業提出了許多眞知灼見。希望同志們繼承和發揚長期形成的優良傳統，履行好參政議政、民主監督職能，鞏固多黨合作的良好局面。習總書記講話表明，中國將堅定不移地延續協商民主制，在此次政協會議將有更充分體現。

筆者以爲，此次會議上李克強副總理通報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草案）》，不僅將成爲今年兩會協商、審議的重要內容，也發出了中國堅定推進體制改革的信號，實現202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的總目標」。應當說，中國「三權制約」與美國「三權分立」是東西方不同政體的典型模式。理論上各有所長，實踐中前者優勢漸顯，這從中國和平崛起與美國歷史性衰落的對比中，可謂洞若觀火。

兩會基調已確定

細讀公報，筆者以爲二中全會爲兩會定下六個基調：**首先，面對嚴峻複雜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發展穩定任務**。中央要帶領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其次，堅定推進行政體制改革**。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處理好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切實提高政府管理水平；要加強公務員隊伍和政風建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其三，深入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重在領導帶頭，貴在深入持久，關鍵在轉變作風；要在學以致用、學用結合、學用相長上下工夫；要堅持用十八大精神武裝頭腦，解決實際問題。**其四，應對嚴峻挑戰**。要增強憂患意識和風險意識、保持清醒頭腦，增強前瞻性、進取性、創造性。**其五，全面推進改革開放**。要尊重人民首創精神，深入研究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體制改革有機結合。**其六，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要加強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反腐倡廉及制度建設，不斷取得人民滿意的成效。

筆者以爲，執政黨爲兩會定基調，既符合中國協商民主制程序，也是中共堅持協商民主制，總能與時俱進地制定科學發展基調，才使中國35年保持着超越西方的發展速度，不斷向中國夢邁進。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民建聯 兩會提案系列之6

加強監管公路建造和使用

近年，內地出現了幾宗大橋和公路塌陷事件。例如2011年發生在雲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縣的一起公路塌陷事故，據報是發生在一段剛剛試通車兩天的路段，被網民稱爲「史上最短命公路」。但該起事故的調查報告卻顯示無論是路基處理、擋牆強度和瀝青厚度都合乎規定，不存在工程質量問題，導致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近期當地有大暴雨。這種調查結論顯然欠缺公信力，有關主管單位的負責人在發生事故後，沒有從設計、施工和監管等主觀因素上去尋找事故原因，反而將事故歸咎爲自然災害，實在不利於汲取教訓、總結經驗。

我國有關公路施工、質量監管以及使用的法律法規主要體現在《公路法》和《公路工程質量管理辦法》之中，各地政府也因應自身情況制定了相關的補充規定，如《廣東省公路工程造價管理辦法》（試行）。在立法層面上，涉及公路建設和使用的各個環節中都能找到相應的法律依據。但爲什麼全國各地依然頻繁出現公路事故？這恐怕是依法行政和執法的工作出現了問題。目前內地的工程領域依然存在轉包、圍標等違規情況，一旦發生事故，發包者和承包者相互推卸責任，往往難以確認事故責任主體，交通和建設部門等主管單位必須針對這些違法情況予以嚴厲打擊。另外，很多公路工程由承建商承接後，主管部門就放手不管，定下的工程質量標準容易成爲一紙空文。因此，主管單位必須主動對工程進行分階段檢驗，才能有效確保質量達標。

除了工程質量問題以外，車輛嚴重超載也是導致公路事故的主要因素。以鄰近的廣東省爲例，省內布滿各種國道、省道以及大小公路。這些路段大多屬高速路段，來往車輛非常頻繁，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往往會造成嚴重的財產損失和人命傷亡。但當我們行駛在這些路段的時候，不時會發現各種明顯超重、貨物搖搖欲墜的大型貨櫃車穿梭於公路之中，一些貨運車輛頻繁進出的路段，路面會出現裂縫、塌陷，部分路基甚至已沉降十幾厘米。由此可知，貨運車輛的超重情況嚴重，而且數量衆多，對路面和路基造成極大損害。

對於車輛超重超載問題，執法部門必須以提高違法成本去予以遏制。內地的貨運車輛尤其是大型卡車普遍存在超重情況，各地執法部門雖然進行過整治，但車輛超重始終屢禁不止。超重車輛長年累月在公路上行駛，對公路造成嚴重損害，現時的罰金制度已難以形成阻嚇，政府有必要增加其他行政處罰手段如拘留、扣車或起碼要通過提高罰金額、強制違法者分攤公路維修費用來加強震懾力。

民建聯

陳太垂涎權力再出江湖

□程宏樊

報刊文摘

離開政府已12年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在踏入2013年後，又一次難耐寂寞，頻頻活動，從批評人大釋法、批評行政長官梁振英施政，到高調宣布新「普選」的主張，令人側目；最近，她又公開聲言「願意」牽頭各大反對派政黨組成新的組織。一系列動作表明她已經重出江湖。年逾七旬的老人如此辛苦，原因何在？

有一種人，在權力與政治誘惑面前，很難擺脫慾望的泥淖。陳方安生便是如此。她從1993年開始擔任首位華人政務司，一直被視作是香港未來管治者的有力挑戰人物，2001年她以「健康理由」辭去政務司長時，幾乎所有本地傳媒和大多數的國際輿論，都將此視作她爲日後問鼎香港最高行政首長積累資本的政治手段。而此後的事實證明這一推測沒有錯，例如2004年她高調參加「七一」遊行批評政府，2005年參與立法會選舉，2008年創立「民間策發會」等，都顯現出對攀上政治高峰的野心沒有消失，直到2007年行政長官選舉時，她「眼甘甘」地將機會讓給公民黨的余若薇，可見其政治影響力已經下滑，之前獲得的「民主女神」稱號，也被余氏奪去。2010年，其丈夫陳棣榮病逝，她逐漸偃旗息鼓。

統合反對派準備2017奪權

正當公衆以爲陳方安生告別政壇、享受退休生活之時，即去年香港新任特首梁振英上任之際，她的政治活動突告頻繁：不斷接受媒體訪問，更不時在公衆面前狠批特區政府，甚至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釋法權力也提出質疑。其言行出位，令人側目。

今年2月，香港多份報章不約而同地透露出一條雷同訊息，指反對派將成立一個類似於「終極普選聯盟」的新組織，陳方安生則被公民黨大力推薦爲該組織的召集人。儘管最後希望落空，前公民黨秘書長鄭宇碩出任召集人，但陳方安生其後又「主動」接受訪問，不斷強調反對派需要團結，以抗衡梁振英爲首的特區政府，爭取雙普選，並指自己「樂意」爲該組織做一些統籌工作，也願意爲此付出精力，云云。陳方安生這一連串的舉動已釋放出非常強烈的政治訊號，即是她將「重返政壇」。

陳方安生重新活躍的目的，不僅僅在於所謂「推動香港落實普選」，或者支持反對派各政黨發展，而是有着更深層的政治意圖。據一名「公共專業聯盟」的資深成員透露，陳方安生「回鍋」有兩大「希望」：一是統合反對派諸政治組織；二是爲反對派2017年參加普選行政長官尋求突破口。

有消息說，一些前港英時期的政治人物，還有一些現任美英「模糊外交人員」，曾多次與陳方安生交換意見，而陳方安生也將這種意見向反對派陣營人士作了轉達。他們認爲，梁振英上台令建制派嚴重分裂，而特區政府管治班子管治能力不高致使民望低落，這爲反對派在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中獲得突破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但當前阻礙反對派在2017年通過選舉歷史性贏得管治權的最大絆腳石，不在於建制派，而在於反對派內部的嚴重分裂。如果反對派諸政治組織能以大局爲重，不互相拆台，則香港未來的政治局勢將發生根本性轉變，由反對派代表人物執政。而有能力讓反對派諸政治組織同上一條船的，陳方安生是最合適的人選。

於是，陳方安生領導的、原本無人問津的「民間策發會」起死回生，扮演了凌駕於各反對派組織之上，協調他們之間「溝通」、「協商」的角色，有人稱其爲反對派的「元老院」。

73歲高齡仍欲作「造王者」

「民間策發會」成立於2008年，表面的目的是爲了陳方安生不再連任立法會議員後，仍能延續其影響力。據熟悉該組織人士透露，操控香港反對派的幕後勢力爲了重新扶植陳方安生，讓她名正言順參與香港政治，重新活躍起來，正密謀將「民間策發會」做大。有傳政治商人黎智英、高德禮等已經作出大筆資助，包括擴大辦公地址、聘請全職人員、簽定與著名公關公司的合作協議；而其核心成員也將有所變動。

往後的日子，可能會見到「民間策發會」在社會上頻繁活動。尤其是在確定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事情上。同時，盡早產生反對派2017年參加行政長官選舉的人選，提早部署選戰，與愛國愛港力量較量。反對派預計，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他們如果不是慘敗，2022年選舉時獲勝的機會就會大增。如此，陳方安生便可成爲「造王者」。今年73歲的陳方安生，關心社會的熱情無可厚非，但是要搞亂香港，多數市民一定唾棄。因爲廣大市民需要的是能爲香港繁榮穩定做貢獻的人，不是興風作浪的禍害者。如果陳方安生不信，儘管試試，到頭來恐怕只能是晚節不保。

摘自最新一期紫荆雜誌